

投稿類別：

史地類

篇名：

無徽不成商—淺探近代徽商的興起與衰落

作者：

李庭嬋。私立曉明女中。高二乙班

董妍恩。私立曉明女中。高二乙班

劉旆辰。私立曉明女中。高二乙班

指導老師：

蔡秉修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商業活動存在中國歷史中千年，從以物易物的單純形態，到貨幣出現、金融系統形成，最後變成現代社會中研究者所熟悉的模樣，過程之複雜令人望而興嘆。偶然在電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中，看到劇中精采刻劃了陝商名家跌宕起伏的發展過程，使我們對「商幫」這樣的中國傳統商業組織產生了好奇：他們是如何興起與組成的？又是如何消逝在歷史洪流中？稍微找尋資料後，研究者鎖定十大商幫中有「無徽不成商」之盛名的徽商作為主題來探討傳統商幫的興衰也想淺看現今的產業能否從徽商的發展軌跡中有所連結和借鑑。

二、研究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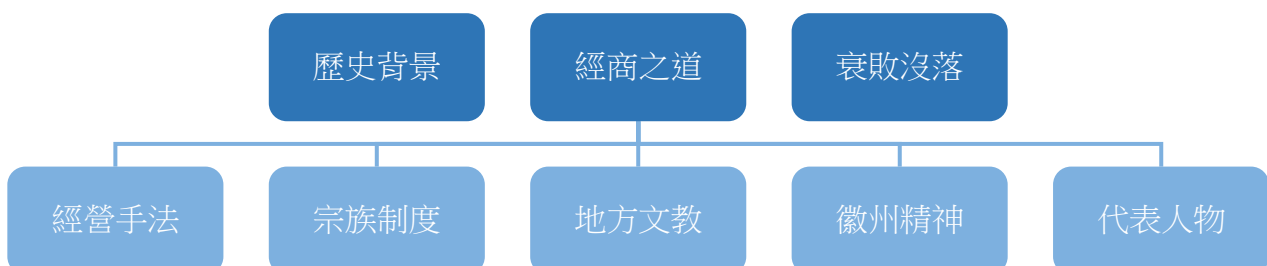
俗語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研究者希望得知在這樣一個毫無優勢的地理位置，是如何培養出長盛超過百年的徽商體系因此研究者希望能透過本次小論文研究達成以下目的：

- (一) 瞭解徽商發跡的原因
- (二) 分析徽商運用的商業模式
- (三) 探討徽商獨特的價值體系
- (四) 瞭解徽商名家胡雪巖經商的過人之處
- (五) 探討徽商的衰敗原因

三、研究方法

研究者主要以文獻探討方式找尋、蒐集資料，文獻包括各類相關書籍、期刊、報章雜誌、論文與網路資料等，以期統整徽商興起至衰敗的歷程，及其主要發展產業的特色，並探索徽商獨特的經營方法及與地方文化的互相影響，望能對於徽商及商幫這樣的中國傳統商業模式有更多的了解。

四、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貳、正文

一、徽商興起的歷史背景

「徽商多商賈，乃勢之所然也。」（顧炎武，明）

徽州古名新安，包含歙縣、休寧、祁門、黟縣、婺源、績溪等共六縣，大約位於今安徽省黃山市。徽州位於華中，周圍群山環繞，缺乏可耕地，農業並不發達，但是由於長江和隋朝始興建的京杭大運河，交通極為便利，可藉水道與江南相通。面對經濟劣勢，許多徽民因此轉而從商，徽商，又名徽幫，便成為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張育滋，2016）。關於徽州居民開始經商的時間，學術界內的定義因為對徽商的界定不同而有多種立論，最早從東晉開始，亦有宋代和明代中葉的說法，以下概述各類商品的大致起始時間先後概述徽商各行業的出現。

徽商最早利用就近天然資源的優勢經營山貨和外地糧食的販賣，例如販賣木材，用以從事建築、造紙等。徽商自宋朝以來即大量從事木材貿易，除在本地收購木材外，徽商也會到鄰近的江西、浙江等地採買原料，並開設木行轉賣木材抽取佣金。到外地經商的商人則多有採買和販賣棉布、糧食等日常用品以賺取價差。徽州好山好水的天然資源除了木材之外還有茶葉，綠茶、紅茶、花茶等都很常見，自古祁門縣的紅茶和婺源縣的綠茶皆頗富盛名（張啟立，2020）。在清乾隆末年時，徽商的茶葉甚至成為出口值的第一位，祁門紅茶也在1915年巴哈馬的世界博覽會上獲得了金獎。

徽商能在明朝中期到清朝這段期間發展達於鼎盛的關係與明代初期的鹽法變革有莫大的關係。明太祖時，邊疆外患嚴重，駐紮北方的軍隊需要長期並且穩定的糧食供應源，於是朝廷就把目光放到了原本就在經營糧食買賣的各大商幫身上，希望他們順便包攬相關的運輸業務。將糧食運送到邊疆除了是苦差事外，也有相對應的風險，需要承擔一路上的山賊、盜賊不說，還得提防送到戰線之後不會捲入朝廷軍與蒙古軍的交戰，於是朝廷給出了利益吸引商人們。在當時，鹽業是收歸國有的專賣行業，朝廷將以商人們供應的軍需糧草份量發給相對數量的「鹽引」，也就是販賣食鹽的壟斷權，又稱開中鹽法，以此吸引商人。不過開中鹽法後來開始面臨了國有企業常面臨的生產率低落問題，於是朝廷簡化了獲取鹽引的過程，讓商人能直接購買鹽引，又改採折色制。徽商利用兩個優勢成功的鹽業的產銷權，第一是地理位置，產鹽的兩淮地區正位於安徽；第二是徽人在朝中的影響力，徽民重視儒學和科舉，從商特質便是亦儒亦商，因此提供了徽商極大的方便。

徽商極為重要的典當業亦不容小覷，是徽商四大主業「鹽木茶典」之一。典當又細分典和當，「典」約指大數目、貴重的不動產等，主要瞄準的客戶群是皇公貴族之流，「當」則為一般民眾家小數額的物品，而徽商因擁有大量的資金，以經營「典」為主。其他商幫的典當業並沒有像徽商一樣發展的規模如此之大是因為不像徽商擁有如此龐大的基礎資金，因此當其他典當行都收利三到四分時，徽商甚至能把利息壓到一分。徽商的典當行業

也跟他們賈而好儒的儒家特質有關，以義取利、取財有道，因此深受民眾喜愛。

二、徽商獨特的經商之道

(一) 經營手法

徽商的經營項目十分廣泛，除了四大主業「鹽木茶典」外，徽商經營的貿易亦有棉布、糧食、文房四寶、漆器、瓷器等，徽州各縣主要經商類別如表一所示。徽商的主要貿易地區為長江中下游，其國內貿易地可達西藏、雲南、遼寧等地，而國外貿易地則可達暹羅、日本，甚至葡萄牙等國家。

表一：徽州各縣經商類別

地區	商業類別
婺源	茶、商
歙縣	鹽商
績溪	菜館
休寧	典當
祁門	布匹、雜貨
黟縣	布匹、雜貨

(表一資料來源：華人百科。2020年7月25日，取自 <https://reurl.cc/14mdDp>)

雖然因為經商而成為富商大賈，但其實大多徽商出生貧窮，經商初期的他們僅擁有少量資本。迫於資金不足的窘境，徽州商人將各自的資本聯合起來，也就是以共同資本為基礎組成一個龐大的商業集團，運用貸資、合資以及委託經營的方式從事貿易。藉著大量資本的優勢，徽州商人們在商場上不只賺取到豐厚的利潤也擴增了自身的勢力。當事業經營到一定程度後，除了共同資本，徽商資金來源亦有遺產資本、婚姻資本、援助資本、委託資本、官僚資本及勞動資本等。而徽商足以在中國商場上得以成功站穩腳步可從其經營手法探究。

其一，長途商品販賣。以木業為例：除了販賣徽州本地之木材，徽州木商亦會遠赴江西省、浙江省等地採購木材，再將其轉賣，進而從中獲利。明清時期徽州木商之勢力極為龐大，當時浙江省開化縣的木材幾乎多由其開發，甚至在政府的准許之下開設了專門從事木材說合交易且可抽取佣金的專業組織「木行」。較有錢的徽商不只擁有數量不容小覷的船隻，甚至會已委託副手、代理人，甚至使用奴僕替其經營。

其二，掌握市場商機。為了獲取更多利益，徽商需精準計算季節、氣候對物價的影響，除此之外亦須了解各地市場之需求，藉著分布於各地的族人，徽商得以掌握相關資訊，這也是徽州商人十分注重宗族關係之原因。面對不同的商品，徽州商人亦會依其行情、季節差價調整經營內容。

其三，加快販運貿易周轉率，使資本得以有效率地發揮最大效益。對於季節性商品，同樣以木業為例：多以水路運輸之徽州木材，於冬季砍伐，等到梅雨季時藉著豐沛湍急的溪水運輸。與此同時，縮短在採購地或銷售地滯留的時間，減少貨物倉儲的費用。如此縝密的安排便減少了運輸及倉儲成本，因而為商人來更大的利益。

（二）宗族制度

徽州作為朱熹傳播理學的重要場所，長期以來受到其文化思想很深的影響，特別是朱熹（南宋）親定的〈家禮〉：「**人們重宗義，講世好，上下六親之疏，無不井然有序**」文中提出建祠堂、明世系、置祭田等方式強化宗族凝聚力，使徽州產生非常注重宗族制度的地方風俗。這樣一種以血緣為樞紐的人群組織，在商業活動中有著怎樣的特徵與影響，下面分為三點：

1、商業壟斷

壟斷在這裡可分成兩方面，分別是某一行業的業務壟斷及某一地區的貿易壟斷。前者的經典事例便是在南京與福建商幫競爭典當行業的過程，福建商幫本小利重，利率往往高達三四成，而徽商憑藉宗族間龐大的資金運轉及人力調度，降低利率，收取利息不過一兩成，最終成功將福建幫排擠出當地市場。當徽商到了一個城鎮落腳，族人鄉黨便會前往依附，逐漸發展徽商的在地勢力。近人陳去病（清）亦云：「**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長江中下游「無徽不成鎮」的說法，由此可見一斑。

2、徽商會館

徽商宗族間的連結密切性，從徽商會館的設立可略知一二。其最初成因，是因到了明末，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運販貿易的擴大興盛，單靠一族一氏已難以應付激烈的市場競爭，便出現了結合宗族與鄉幫的組織—徽商會館。清朝方志學家許承堯曾言：「**吾徽人篤於鄉誼，又重經商，商人足跡所至，會館義庄遍行各省**」（張海鵬，1995）會館具有多種功能，如維護徽商在外地經商時的利益，或作為代表與官府進行交涉等。這些功能最關鍵的部分便是能夠聚集各族力量，聚於此的宗族甚至會藉由婚姻加強連結，可說會館是宗族力量聯合的產物。

3、系統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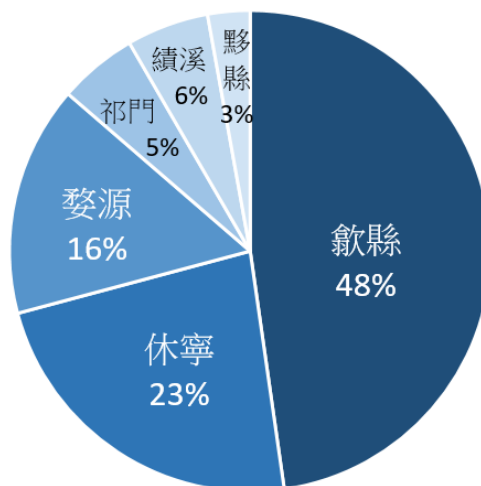
當經營規模較小時，徽商的合夥對象多以兄弟、父子、叔姪為主，而當經營規模擴大，便開始需要任用夥計。「**以管理層次而言，一般分為代理人、副手、掌計、店伙與僱工五層**」（蔡洪濱、周黎安、吳意雲，2008）。其中掌計以上大多是宗族弟子擔任，被要求絕對的聽從與忠信，例如徽商程澧，「**諸程聚族而從公，惟公所決策**」（汪道昆，明），利用族規加強對各級伙計的控制。同時，對於表現良好的宗族弟子，除

了金錢上的獎勵，徽商也利用宗族內的地位或聲譽作為獎賞的手段；相對的，一旦有人欺隱或私自謀利，不只要面對雇傭關係的解除，還要面對嚴厲的族規懲罰，「如歙縣羅氏宗族的族規家法規定，對侵犯宗族利益者，不僅要被革除族譜還要面臨酷刑」（蔡洪濱、周黎安、吳意雲，2008）。這樣正反立意的懲罰與獎勵機制，非常有效的建立起商幫與宗族相輔相成的約束關係。

（三）地方文教

「科舉仕宦與商業致富，對於徽州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若踐更，相互為用。」（葉顯恩，2005）徽州自古以來便是人才輩出之地，著有《四書章句集注》的朱熹抑或是清末民初提倡新文化運動的胡適皆是徽州人。明代中進士之徽州人有 508 人，占全中國 1.82%，清代更有 759 人，占全中國 2.55%，其進士總人數於當代各州中可謂名列前茅；而徽州中狀元之人數更是不在話下，清朝自採行至廢除科舉以來共錄取 114 位狀元（其中包含兩位滿狀元），而來自徽州本籍及寄籍之狀元有 19 位，佔比將近 17%，為全國之冠。

圖一：徽州各縣狀元人數比例



（圖一資料來源：李琳琦（2001）。明清徽州進士數量、分布特點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9（1），33-35。）

徽商之所以可以成為中國歷史上鼎鼎大名的商業集團之一，可追溯至其宗族觀念，並可歸功於其著重教育之理念。徽州許多大族不是書香世家便是官宦世家，光宗耀祖是當代家族倫理的核心觀念，因此他們特別重視教育並有著「官本位」的信念，其目的無非是為了維持宗族既有的地位與特權，不只傳承原有的宗族體系也繼承了崇儒尚教之傳統。除了政治目的外，為了應付變幻莫測的商場，商人亦須具備一定的專業商業知識與社會知識，以利他們更加容易掌握市場。

為了使後代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以進入官場，徽州人於當地廣設各種教育機構，舉凡私塾、義學、書院、文會等民間教育場所大多由徽商成立，大大彌補了官學之不足。據

《徽州府志》記載：「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丁廷楙、趙吉士，2010）徽商家中大量的藏書可謂積書滿架、汗牛充棟。如此文風昌盛之地便素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

除了廣設學校，徽州人為了強化當地崇儒重仕之風設置了許多牌坊。徽州被譽為牌坊之鄉，在上百、上千座牌坊中，大抵多是「世科坊」、「進士坊」、「狀元坊」等紀念科舉名士之碑。不只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更給予當地子民們追求功名之動力。對於後代子孫之栽培，徽商不只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場所，也給予其極大的資助，不論是家庭生活費或進京趕考之費用幾乎由徽商一手包辦。

徽商與科舉不只密不可分，更可說是相輔相成。顯赫的科舉背景成就了許多達官顯要，藉著強而有力的政治後盾，徽商得以在鹽業、茶業、木業等行業中獨佔鰲頭。除此之外，這些入仕的徽州人亦成了徽商在朝廷中的代言人及政治保護傘，在行政上竭盡心力維護徽商之利益與權力。借助官力發展商業，再以商業所得栽培子孫進入官場，在此循環之下便造就了在商場上呼風喚雨的徽州商人。

（四）徽州精神

由於重視教育，徽商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因此徽商特重商業道德倫理。徽州素有「文獻之國」、「禮儀之邦」的美稱，尤其在南宋理學興起加上當代大儒朱熹之影響，徽州當地遂瀰漫濃厚的儒家道德觀。

1、獨到精準的眼光

相對其他商幫，在桃李滿天下的徽州，徽州商人由於從小接受教育，面對商場變化及投資貿易時能有更出色的表現，因而得以在眾多商人中脫穎而出。

2、以誠為本的信念

自古代以來，商業普遍被視為投機取巧、唯利是圖、利慾薰心；管仲提出的「四民」之中，商人亦排其末；中國歷代以來更多次實施重農抑商之政策。

然而徽州商人卻十分講究「誠信」，甚至主張摒棄巧詐、機智的商業手段。徽商會有此觀念是因其了解商人必須以誠信對待顧客，才能得到其信任，在彼此互信的基礎之下，才更容易達到彼此雙贏的局面。來自徽州歙縣的商人許憲（明）曾言：「唯誠待人，人自懷服；任術御物，物終不親。」此話便是徽商以誠待人之展現。

除了以誠心待人，徽商抑保持著童叟無欺、市不二價的信念。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上，能秉持這般信念又能賺取豐厚的利潤，徽州人的經商手腕著實不容小覷。

3、乘風破浪的膽識

地狹人稠的原鄉，徽州人不得不離鄉背井，另謀出路。縱使需面對人生地不熟的異鄉以及一路上未知的冒險，但為了家族的生存與發展，徽商只能放手一搏，勇於向現實挑戰。

(五) 代表人物

胡雪巖，名光墉，安徽績溪人，出生於道光三年（1823），歷經了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在這樣一段中國社會面臨內外夾攻、國力不斷衰敗的時期，他卻得到了「古有先秦陶朱公，近有晚清胡雪巖」如此盛讚，其中所付出的心力著實難以想像，也實在令人佩服。

胡雪巖出身微寒，關於他早期的經歷眾說紛紜，有人說他在糧行做掌櫃，得到老闆賞識成為掌櫃；也有說法是他在錢莊工作，並吸收了大量金融知識。但關於他的發跡說法頗為一致，便是藉由資助官員，得到更好的商業機會。最初，他將目光放在一名為王有齡的年輕人身上，彼時王不過是名落魄官二代，有個不大不小的「候補浙江鹽大使」職位，然他不甘於此，想追求更高的位子卻苦於資金不足。當時在錢莊工作的胡雪巖挪用了公款替他解決了這個煩惱，順利在王日後飛黃騰達時搭上了這棵大樹。咸豐十年，王有齡成為浙江巡撫，鼎力相助胡雪巖的阜康錢莊，胡雪巖便在他的庇護下開始累積大量資產。

然而，當王有齡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戰役中因杭州失守而自盡後，胡雪巖不得不另尋靠山。為達此目的，胡雪巖不求回報地贊助軍糧，最終成功獲得晚清名臣左宗棠的賞識，成為其得力助手。太平天國平亂後，胡雪巖致力恢復杭州昔日榮景，使杭州迅速恢復元氣並且得到「胡大善人」這般的美稱。此事蹟使左宗棠對其印象深刻，甚至日後在奏摺中提到：「按察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辦諸務，悉臻妥協。杭州克復後，在籍籌辦善後，極為得力。其急公好義，實心實力，迥非尋常辦理賑撫勞績可比。」（左宗棠，清）。同治五年（1866），他協助左宗棠興辦福州船政局，與左建立了緊密的官商關係，不斷擴大自身產業，如知名藥坊胡慶餘堂便是此時創設。同時他多次替左宗棠向外國銀行籌貸軍費，對其遠征新疆能夠順利功不可沒，因此在胡 58 歲時得到了布政使一職，由於其官帽上可用紅色頂戴，胡雪巖便獲得了今日我們所熟悉的「紅頂商人」稱號。

但好景不常，胡花費二三十年打造的商業帝國，卻在短短三年內轟然傾倒。他的失敗，起於光緒八年（1882 年）一場與外商的生絲商戰，因此損失了一筆金額。當時李鴻章為遏止左宗棠的勢力，欲「排左先除胡」，有意延後胡雪巖的餉款（欲還給外商的貸款利息），導致胡雪巖不得已從阜康錢莊取了現銀出來。消息一出，人人都傳胡雪巖生意失敗，錢莊即將倒閉，上海、杭州等地瘋狂興起擠兌潮，每人想把存在錢莊裡的錢取出來，一年之內有七間胡氏錢莊銀號相繼倒閉。光緒十一年（1885 年），左宗棠去世，胡雪巖

被抄家，一代巨賈抑鬱而終，徽商在典當行業的帝國亦隨之傾垮。

三、徽商晚期的衰敗沒落

徽商從明朝興起，直至乾隆末期，縱橫明清商場五百年，陳去病（清）《五石脂》稱：「**徽郡商業，鹽茶木質鋪四者為大宗。**」徽商的衰落，可以大致分為前後兩階段，分別以鹽業跟茶業的衰落為主軸，旁及木業、典當及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

鹽業作為徽商最主要的資本來源，長久以來靠著壟斷長江以南的官鹽販售積累了極為雄厚的資本。但隨著鹽商資本日益茁壯，清王朝對鹽商的正雜稅捐也日益加重。如嘉慶年間，以徽州鹽商為主導的兩淮鹽場，各種加丁、加斤、養廉等雜稅居然高達九十二種（張海鵬，1995），形同官府的勒索詐取，造成徽州鹽商財力疲乏。在此困境之下，鹽商不斷壓低收購成本，極力抬高售價，甚至在鹽中參和泥沙。然而，過度的壓低給予鹽戶的收購價，又以幾十倍的價格售出，造成普通百姓難以負擔，且鹽品質極差。時間一長，市場上便開始出現大量私鹽交易，當時長江下游「**私鹽充斥，鹽徒聚眾販私**」（師懿德，清），即便大清朝律令明文規定：「**凡販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政府也嚴加查禁，依然無濟於事。

嘉慶末道光初時，徽州鹽商已經處於市場丟失、財源蝕空的艱難處境。而這種私鹽氾濫的情況到了道光年間才藉由進行鹽法改革得到改善，亦是將徽州鹽商推向絕境。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帝奏准改鹽法為票鹽法，取代原先的引鹽法。所謂票鹽法，是指只要商人到鹽場繳交鹽稅，便可以領票取鹽販售，自由競爭，不必如先的引鹽法需要朝廷核發的鹽引才可販鹽。如此一來，徽商原先靠著和朝廷的良好關係及低收高賣所得到的暴利跟優勢都不復存在。鹽業是徽商最重要的現金流來源，一旦失去了足夠的資金支撐，徽商其他產業便也受到重大打擊，成為徽商衰敗最主要的原因。

鹽業衰敗後，茶葉便成為徽商行業中最重要的一項。但在咸豐、同治以後，它開始受到內銷及外銷的兩方衝擊。外銷開始和因開港通商大量進入的印度茶、日本茶競爭，特別是日本茶，工業化的製作過程大幅減低成本，相較之下，徽商所掌控的中國茶產業還停留在傳統手工產業，出口價格高昂，就連原本頗富盛名的「祁紅」與「屯綠」出口亦日漸減少，道光廿四年（1844），由最高收購 26 萬擔，下降到不到 8 萬擔，無法競爭之下便是沒落。

接著是木業。咸豐五年開始實施的釐金制度，稅卡林立，稅金更是因連年戰亂不斷升高，原本專擅長途輸、長期掌握江運的徽商深受影響，同時江運又受到海運的挑戰，成本越發高漲，木材這樣運輸成本極高的產業便漸漸衰微。

此外，清朝中後期的連年內亂，也給予衰敗中的徽商沉重打擊，而其中尤以太平天國動亂所造成的影響最為嚴重。典當業算是最後傾倒的支柱，一直到光緒十一年（1885 年）「紅頂商人」胡雪巖倒台，才算完全失去影響力，至此以後，偶有一兩個新興的徽州商人，卻再也沒有恢復明清盛況。總體而言，徽商的衰敗可視為其無法適應變化快速的時代潮流

與制度變革，且應變不夠快速靈活所導致無可避免的結果。

參、結論

在徽商能夠成功壯大勢力並長足發展的眾多因素中，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在文化與道德方面。徽商崇儒尚教，鄉人事業有成後往往廣設學堂，增進族內弟子受教育的機會，此舉大大增加徽人入仕的比例，進一步擁有了官商相護的保護傘。同時講究以義為利、取財有道，誠信也是徽人經商的重要核心思想，這樣獨特的文化使徽商能夠取得社會信賴，藉此得到更多貿易機會或人民支持。宗族制度的配合亦是重要一環，重視族規、講究長幼尊卑，使徽商形成一套以血脈為本，結構分明且連結緊密的運作機制。

研究者認為這樣的特色與現代的企業文化概念頗為相似。馬雲（2011）曾說：「企業文化是一種油然而生的使命感。一群人因為有共同目標而組織起來，從而產生比離散的個人更為強大的力量。」若將儒家文化類比為徽商獨到的企業文化，能夠看見確實對於其商業經營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賦予成員共同的道德信念與使命感，使其對組織本身有更強的向心力；宗族觀念讓徽商發揮比起同一時空背景中的其他商幫更多成員間的認同與相生相成的緊密連結。

然而，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似乎也間接導致其無法順利接軌適應變化快速的社會，徽商的恢弘事業便也在短短幾十年中灰飛煙滅。當初因制度改革而崛起的徽商，最終也敗在相同之處，令人不勝唏噓。研究者希望能夠藉由此研究，對商幫這樣的中國傳統商業運作模式有基本了解，而對於徽商與不同商幫間的比較研究，則有待日後更深入探討。

在現今變幻莫測的社會中，我們時常能發現許多產業因無法適時做出改變而沒落，如臺灣許多的成衣廠、食品加工廠皆已成為所謂的「黃昏產業」，面臨的無非是縮減經營規模而後不斷賠本，最後只能結束大半輩子拚搏的心血，與徽商的歷史演進無異。以史為鑑，所幸在現代社會中，產業轉型的意識已經升起，配合政府輔導、補助等，越來越多即將沒落的產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與特色。透過產業空間移轉和持續創新等方法，回復了自身的市場佔有率，保留自身的獨特同時也繼續創造獲利。研究者期能透過此次歷史研究，懷古望今，縱然徽商輝煌的時代已然逝去，我們依然能從中提取歷史經驗，應用到現代，謹記教訓以防重蹈徽商的覆轍。

肆、引註資料

陳去病（清）。**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顧炎武（清）。**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丁廷樞修、趙吉士纂（清）。**徽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左宗棠（清）。**左宗棠全集**。湖南：岳麓書社。

吾妻重二（2012）。**朱熹《家禮》實證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海鵬（1995）。**徽州商幫**。臺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卞利、葉顯恩 (2016)。徽州文化全書：徽州民俗。臺南：中華聯創。
- 李琳琦 (2001)。明清徽州進士數量、分布特點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9 (1)，33-35。
- 張育滋 (2016)。明清時期的杭州徽商—以黟縣宏村遷杭汪氏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張啟立 (2020)。徽商因何足跡遍布全國？2020年7月14日，取自 <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years/3452>
- 周黎安 (2014)。從鹽法看晉商和徽商之崛起。2020年7月15日，取自 <https://news.cnyes.com/news/id/1203551>
- 蔡洪濱、周黎安、吳意雲 (2008)。宗族制度、商人信仰與商幫治理：關於明清時期徽商與晉商的比較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87-99，118。2020年8月25日，取自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4754905/>
- 華人百科。2020年7月25日，取自 <https://reurl.cc/14mdDp>